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NSD

第011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

2022年11月

目 录

本期导读

01

学术聚焦

02

- 当前的两个金融难题和一点建议 黄益平 02
- 中国金融的特色、挑战与改革重点 张健平 04
- 中国金融改革的特色与效果 王勋 08
- 圆桌对话 | 如何读懂中国金融的特质与改革逻辑 黄益平、张健平、王勋、黄卓 11

月度精选

15

- 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逻辑与世界意义 林毅夫 15
- 中国经济的关键挑战与应对 姚洋 18
- 全球滞胀来袭，中国如何应对？ 卢锋、任慧 21
- 国家医保制度的发展创新：药物经济学成为价值购买的重要抓手 刘国恩、吴晶 23
- 数字时代下的多元雇佣关系 李力行 26
- 00后的多元求职心态与工作形态 胡佳胤 28

学院资讯

30



本期 导读

北大国发院简报

第011期

亲爱的读者：

感谢您的订阅，《北大国发院简报》第10期与您见面了。每一期，我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在信息过载、高噪音、碎片化的时代，为您精选高质量的内容，同时也方便您用相对集中的时间深度阅读。

本期简报主要内容仍是“学术聚焦”与“月度精选”两大部分。

“学术聚焦”的内容来自我们10月13日举办的第8期“承泽论坛”暨《如何读懂中国金融》新书悦读会。黄益平教授指出了当前金融的两个难题并提出政策建议；张健平教授论述了我国金融改革的特色、挑战与改革重点；王勋副研究员基于《如何读懂中国金融》这本书介绍了中国金融改革的特色与效果；圆桌对话环节，与会学者

就一系列重要问题做深度解答与讨论。

本期“月度精选”包含六篇文章，分别是林毅夫教授对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世界意义的解读，姚洋教授指出中国经济的三个关键挑战并提出政策调整建议，卢锋教授和博士后任慧对于全球滞胀的分析和中国应对之策的建议，刘国恩教授和吴晶教授对于药物经济学在国家医保制度发展创新中所起作用的解析，李立行教授对于数字时代下多元雇佣关系的论述，以及胡佳胤助理教授关于“00后”多元求职心态的调研分析。

感谢您的阅读，也欢迎您的反馈。在简报最后，我们附有订阅二维码和联系方式。

主编：黄卓
执行主编：王贤青
2022年11月30日



当前的两个金融难题和一点建议¹

黄益平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特别感谢人民日报出版社将《读懂中国金融》这本书出版。我国目前这套金融体系在过去效果不错,但如今面临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点:一是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在减弱;二是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在上升。

务实的改革策略下一步该怎么走?我认为首先是解决上面这两个问题。

从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角度看,金融需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需要创新,甚至需要金融开放。与此同时,系统性风险问题也不容忽视。中国现在面对各种复杂情况,过去我们用快速经济增长来消化问题,用政府兜底来支持投资者的信心,这套办法将来可能很难持续。

当前的金融监管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这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发展趋势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对于上述问题,即将召开的二十大以及此后可能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应该都会进行大的布局,值得期待。

在我看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逐步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应避免把一些权宜之计变成长期政策。然而,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在支持中小微企业方面,政府做了很多事,相关数据也显示这两年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增长非常快。然而通过我们的量化分析研究,对提高和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真正起作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行政性的监管要求。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不达标,年底就会被监管问责,因此这几年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增长快。这一举措短期看效果不错,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十年甚至二十年会产生何种后果,这一点需要认真考虑。金融机构需要做市场化的风险定价,只有符合其商业利益和风险控制能力的业务才能长期持续。因此,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需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相应的解决办法也有很多。比如,可以更多

1. 本文根据黄益平教授2022年10月13日在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8期暨《如何读懂中国金融》新书悦读会上的演讲整理。

地使用一些新型金融工具，包括我们一直在研究的利用数字化手段帮助金融机构做风控。在利率问题上，金融机构能否更加灵活？倘若我们直接地、持续地压低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短期看对中小微企业是好事，长期来看则不见得是好事。对于风险较高的企业，只有通过市场化的风险定价，一定程度上提高其融资成本，金融机构才有利可图，才能长期持续。为了在短期内解决问题，政府的确想了很多办法，但若想长期发展，就需要从根本上厘清金融逻辑。

第二个例子，在控制管理金融风险时，最近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中央把维持金融稳定的责任压实到地方”。这一举措作为短期手段可能有效，但如果长期把责任都压在地方政府身上，

难免也有局限。假设将来地方政府需要为其辖区内所有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责任，地方政府会有何种新作为？如果地方政府不具备相应的监管能力，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化解风险，又会如何解决？

综合来看，政府想办法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的做法可以理解，但从第一个百年目标到第二个百年目标，构建金融体系需要综合考虑很多深远和宏观的问题，不能只顾眼前。

我的建议就是我们要认真构建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稳健地支持我们的经济走向第二个百年目标。金融体系正在迎来大变局，这是经济创新发展的需要。相信未来一段时间会有很多令人振奋的改变，让我们一起期待。



中国金融的特色、挑战与改革重点²

张健华

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央行研究局前局长、华夏银行前行长

非常感谢黄益平老师邀请我来参加悦读会。我的第一份工作在央行从事金融监管，持续十多年，所以对金融企业的微观运作、监管政策和行政干预手段等都有所了解。后来负责金融稳定等偏宏观的工作，之后到央行研究部门做了一些更宏观、务虚的研究工作，后又到人民银行的分支行，再后来又做七年的商业银行行长，从监管转成被监管，直到今年年初到清华去专职当老师。

因为这一路经历，我对《读懂中国金融》这本书更有体会。在多年的金融从业经历中，我既经历了很多金融改革实践，也阅读了不少相关文章。央行前行长周小川、行长易纲都有不少关于金融改革方面的文章，从宏观和整体角度以及非常高的站位分析和论述了金融改革的逻辑，但像黄益平老师和王勋老师这样从系统、完整特别是规范的经济角度来分析的文章我是第一次读，因此印象深刻，受益良多。

结合这本书的读后感，跟大家分享我关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几点观察。

金融改革的几点观察

第一，中国金融改革一直滞后于经济改革。

我国的经济改革从1978年开始，金融改革是从1984年“人工（两行）分家”开始。我们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建设金融体系，经历了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相继

恢复成立，到央行功能的逐渐完善。但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改革始于1984年，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以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为主体，其他各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

事实上，金融改革相较于经济改革滞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金融在任何国家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也只有当经济发展有需求，金融业发展才有动力。

到今天为止，我们的金融改革仍然滞后于经济改革。比如，“金融没有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个声音一直都在，只不过近期更加刺耳。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比较偏激，因为金融可能只是对部分领域的实体经济支持不够，比如对创新领域支持不够，在转型期对消费支持不畅等。原来金融关注的是生产端，中国迈入中高收入国家后，金融要多关注消费端；原来金融更多关注的是企业客户，现在要多关注居民客户和家庭部门的需求。

因此，尽管金融改革还存在很多滞后问题，但“金融没有支持实体经济”这样的说法也不对，至少不准确。

第二，中国金融体系承担了经济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的很多成本。

1998年，银行剥离不良资产，主要是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所管理的不良资产也多是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

2. 本文根据张健华教授2022年10月13日在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8期暨《如何读懂中国金融》新书悦读会上的演讲整理。

2003年，中国的银行大量改制上市时，又进行了二次资产剥离，剥离的主要还是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

因此，国企改革的很大一部分成本被银行体系承担。

第三，以国有控股为主的金融体系既是政府调控金融资源的关键抓手，也决定了金融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和约束激励机制。

到目前为止，中国金融机构以国有控股为主，必然会受到政府理直气壮的干预。同时，除了通过监管政策对金融机构进行干预，政府作为出资人也对金融机构有很多干预。此外，我们的金融机构多为国企，国企有自己的行为模式，在业务经营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一定不是风险偏好型而是风险厌恶型，这些特点都很鲜明。

除了考核利润和资产质量等财务指标外，国有企业还受很多制度上的约束，使得国有金融机构和其他国企一样，既有其自身的优势，也面临着同样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约束与激励问题。

第四，金融改革的目标基本实现。

这主要表现为金融业规模扩大，体系健全，有效支撑了经济快速发展，自身也为GDP贡献很大，包括解决几千万人的就业。

第五，大型金融机构的市场地位日益增强。

尽管中国金融体系复杂，金融机构较多，但近年来大型金融机构的市场地位在不断增强，风险主要集中在中小金融机构上。

第六，外界批评声较多。

这些批评包括“脱实向虚”、利润过高、支持科技创新不足、小微企业长期存在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消费信贷发展滞后导致支持消费不畅、对消费者隐私保护不足、缺乏系统性金融文化等。

比如，消费贷目前主要靠平台企业在做，导致平台企业需要进一步进行规范整顿。比如“利润过高”也是一个悖论，因为一旦进行

价格管制，市场就有可能萎缩，最终导致社会福利减少。书中提到“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我认为也应该是中国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评价标准，而一旦市场停下来，恐怕就谈不上“改进”。

再比如，现在我国的金融业从业者很多，很多名校优秀毕业生进入金融体系，但金融文化至今尚未真正建成，包括敬畏风险、以客户为中心、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不能脱离经济基本面等基本从业理念依旧不足。

以上六点是关于中国金融改革的观察，下面再举些例子。

首先，我国金融保险业占GDP比重快速上升。2012年，我在央行主持中国金融改革的“十二五”规划。当时金融保险业在GDP的占比为6%，并希望未来能保持在6%-7%，但近年已超过8%。对比中美英三国情况，截至2021年底，英国金融保险业在GDP的占比为6.1%，美国为8.1%，中国达到9.2%。2000年入世之前，我国金融保险业在GDP中占比仅为4.8%。对此巨变，好的评价是：“我国的金融业取得长足发展，目前已成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型行业”；不好的评价是：“金融业最终依靠的是实体经济部门产生的利润，却又高于社会平均利润。”总之，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快速发展，截至2021年末合计已有5000多家金融机构，并且还不包括众多的市场中介机构，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增长最快。

针对上述批评，我最近也在做一项实证研究，内容是关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农信机构贷存比十年间变化的情况，借以判断农村信用社在改革后的支农效果是高还是低。贷存比是很重要的指标，可观察在当地取得的资金是不是又投资于当地，同时当地多余资金是不是通过省级联社又投回市场。我把分别位于东部和中部的两个省县域农信机构的贷存比数据进行分析，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东部和中部地区农信机构贷存比近十年都在上升，

说明金融对地方经济起到了支持作用。

另外，我们最近也在做涉农贷款研究。从近年来收集的各个地市县级机构的涉农贷款数据后发现，中部省份的贷存比比东部省份低 10 个百分点左右。换句话说，东部省份的金融机构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更大，因为东部省份的县域经济更发达。从整体来看，东部省份农信机构十年间存贷款的市场份额基本保持稳定。

这里再说一个关于大型金融机构的问题。前几年，国有大银行利润增长比较稳健，体现了金融改革的效果。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不仅规模在增加，盈利能力也在上升，这与其内部管理不无关系。通常，大行的内部管理相对来说更严格，相应的制度安排也决定了它们很难被少数人操控，所以利润增长比较稳健。但是从税后利润来看，因为规模大，国有大行的利润都比较高，增幅也比其它机构高，并且将来这些差距还会越拉越大。

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产出效率。从上市银行的 ROA(资产收益率)和 ROE(净资产收益率)数据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对比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来说都不低，这反映了金融改革的成效，以及我们的金融体系参与了高度的市场竞争，并不是依靠所谓的“垄断行业”“牌照价值”或者“许可权价值”。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在十年前就曾经讲过这一点，认为这可能与国有大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内部治理水平提升有关。

尽管中国金融业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但金融机构的市净率和市盈率很低。从中美英三国银行对比来看，中国银行业的市净率仅为 0.63，英国为 0.96，美国为 1.22；市盈率同样如此，中国为 5.3 倍，英国和美国都是 10 倍以上。中国保险业和券商的市净率和市盈率反而高一些。银行利润很高但市场估值不高，导致一系列问题，包括资本补充难度加大等。这反映出资本市场如何看待中国银行业，以及如何看待我们金融业的未来。

我在研究中还做过一个比较，观察中国的银行业估值到底合不合理。结果发现，银行业估值中枢大概是 5 倍，饮料行业估值中枢在 40 倍左右，地产行业下跌严重但估值中枢也还在 10 倍左右，计算机行业估值中枢大概也是 40 多倍。这说明资本市场对中国金融业的未来并不乐观。

当前环境和主要挑战

第一，经济趋势性下行（非周期性）。

经济呈趋势性下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我们常说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就有新特征。我们金融业的新特征就是规模足够大，体系足够复杂，但服务能力没有完全跟上，结构性调整没有完全到位。

首先，当经济开始趋势性下行，金融业会表现出不良率上升，导致资产处置压力加大，最后直接影响当期利润及内源性资本补充；同时，由于银行业是一个高度周期性的行业，其不良率可能无法在短期内消除，而是持续很久。

其次，经济趋势性下行还会导致优质资源荒，即好企业相对变少，进而影响到未来的行业发展。

最后，经济趋势性下行还会引发一些潜在问题，如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大，甚至倒闭，并且违规现象增多。今年一季度末，中小银行总资产占比只有 29%，不良贷款占比却高达 47.2%。

结论是，我们以往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一些经验未必再适用，现在必须要把存量盘活或实施结构性改革措施。尽管我们原来认为结构性改革需要的时间长、周期长，但这项工作可能还要下决心、花大力气推进。

第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大，且大概率是逐渐恶化。

对此，我们就要及早做准备，思考如何应对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加大、政策选择空间缩小、海

外金融资产风险增加、人民币走出去受阻等一系列的新挑战。

第三，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规模增长难以继，需要出台结构性调整政策。

如果仅以 M2/GDP 作为衡量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指标，我国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高度“金融抑制”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高度货币化。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1 年末全国宏观杠杆率为 272.5%，相较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 2019 年上升 17.3 个百分点。政府、居民及企业杠杆率均较 2008 年有所上升。金融部门由于监管持续加强，资本实力得到增强（杠杆率基本保持稳定）。

在讨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与否时，单纯从总量上来看，支持力度已经不低，问题主要在于结构。怎么解决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是不是一定要由政府出面？货币政策可以发挥哪些作用？这些都值得探讨。

第四，监管规则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

现在应加大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提高拨备覆盖率（也称为“拨备充足率”，是实际上银行贷款可能发生的呆、坏账准备金的使用比率），进一步加大资本充足率等。但实际上在经济下行周期时又很难兼顾这些要求。

第五，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资本的补充难度加大。

2003 年中国大量的金融机制改制上市时，多数银行按 1.2-2 倍的市净率引入战略投资者，但如今银行业在二级市场上已经失去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控股银行不允许低于净值去发行股票的限制规定。

第六，宏观调控及监管的行政性手段或工具增多，如指标限制、窗口指导等。

这一类问题出现的潜在原因包括：不同部门

对市场化方向的理解不同；对各自职责的解释不同；宏观审慎管理在微观层面落地时的角色定位不准；“家长主义”导致监管边界不清，主管部门时常代替股东、市场及客户进行决策或做出选择。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或市场主体的非审慎，甚至是利益驱动导致的非理性或主观故意。

第七，金融稳定与社会稳定交织在一起导致风险难以出清。

第八，多数金融机构未做好应对数字化时代的准备。

这包括金融机构自身的数字化建设，以及金融机构如何为数字经济提供相应的服务等。

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几点思考

第一，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不因行政手段短期有效而过分依赖，包括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小微融资、绿色低碳等）。

第二，坚持系统化的解决思路，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改革重点任务，但要有统筹规划及分布实施路线图。

第三，按大国金融进行思考，政策调整时充分考虑对本市场的影响及外围市场的影响，并与市场进行充分沟通，避免人为引发市场动荡及始料未及的外溢效应。

第四，明确各市场参与主体的职责定位，规范政府、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及消费者各自的行为。

第五，建设良好的金融文化，把保护消费者利益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第六，适应数字化社会的需要，全面提高监管和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能力。

第七，改变以往靠规模增长解决问题的思路，真正做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金融改革的特色与效果³

王勋

北大国发院副研究员

我跟随黄益平老师做研究十几年，很高兴能与黄益平老师合作出版《读懂中国金融：金融改革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金融体系的三个困惑

中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改革当中有很多令人困惑的问题，这本书主要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政府的主要方向是对经济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革，但为什么对金融体系还有如此普遍的干预？

第二，一般而言，政府干预过多，就越会扭曲资源配置，降低金融效率，进而阻碍经济增长。但为什么中国在金融体系受到普遍干预的情况下仍能实现长期的、高速的经济增长，同时保持了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

第三，既然中国的金融体系帮助创造了经济奇迹，为什么近几年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要理解这三个问题，就需要把中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改革放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体系的大框架下考虑。

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的经济体系改革大致是双轨制的、基于渐进式策略的改革。“双轨制”

就是在保留原来的“计划”轨的同时，不断地引入“市场”轨，这样一方面能保持稳定，另一方面能提高效率。双轨制体现在实体经济中主要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并存，同时又动态变化。“渐进式”策略指的是我们的改革不是一下子全放开，而是根据社会、经济、政治情况逐步提出并实施改革举措。

中国金融体系的突出特点

中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体系的特点，主要还是取决于实体经济的改革和实体经济的要求。在这本书里，我们把中国金融体系的特点简单总结为——规模大、管制多、监管弱、银行主导。

特点一，规模大。中国的金融机构数量当前已经比较多，种类比较齐全，并且资产规模比较大。在1996年的全球十大银行排名中，中国只有工商银行一家入围，而且排在最后一个；2019年的排名中，中国四大行都入围，而且占据前四位。另外，中国的直接融资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市值也都处于世界前列。

特点二，管制多。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政府的干预相对较多，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对金融价格的管制，比如对利率的管制，对汇率的干预等；第二是信贷资金的配置，在企业所

3. 本文根据王勋副研究员2022年10月13日在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8期暨《如何读懂中国金融》新书悦读会上的演讲整理。

有制、企业类型方面仍有所偏向；第三是对民营资本进入金融市场的限制；第四是对跨境资本流动即资本账户的管制。

我们把这些管制措施综合到一起，构建出一个金融抑制指标，通过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相比较，可以获得几个信息：第一，在政府对金融体系干预的程度上，中国不但高于高收入经济体，而且显著高于与中国处于同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第二，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跟经济体系的改革策略相同，即一方面坚定地市场化迈进，另一方面也渐进性，不是一下子全部放开。

特点三，监管弱。中国金融监管的效能仍有待提高。监管滞后于市场和技术的发展。中国的监管模式是机构监管，但金融机构大都混业经营，导致冲突、矛盾和一些监管空白、监管套利空间，甚至导致金融风险。最近这几年，金融风险在多领域存在，包括股市、债市、房地产、中小银行、数字金融领域等。如果把这些风险放在一起测算，可以看到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上升。这已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特点四，银行主导。这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在中国金融体系当中，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股权融资市场相对滞后；第二层是中国的银行体系主要由国有大型银行主导。我们把金融抑制指数和金融结构衡量指标（银行资产/金融总资产）放到一起进行国际比较，可以看出中国香港、美国这些经济体一方面金融抑制程度较低，另一方面其直接融资市场比较发达，而中国、巴西这样的经济体，不仅金融抑制程度较高，而且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

我们还测算了金融抑制政策的动态效果，样本期从1979年到2008年，即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总的来看，效果是正向的，意味着在这期间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总体而言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分阶段来看，就会发现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出现结构性变化，2000年之前，即上世纪80和90年代，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是

显著的促进效果；2000年之后，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效果则变成了显著阻碍，由正向转为负向。

在金融当中有两个相互竞争的效应，一个是麦金农效应，一个是斯蒂格利茨效应。麦金农效应的意思是，发展中国家有太多金融管制和干预，不利于金融效率的提高，不利于金融深化，所以就不利于经济增长。斯蒂格利茨效应是说，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市场机制相对较弱，信息环境较差，因此金融抑制有助于快速实现从储蓄到投资的转换，支持金融稳定，从而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对应到中国来看：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主要体现为斯蒂格利茨效应，整体来说市场机制还在培育，信息的条件也没那么成熟；而在2000年之后，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主要体现为麦金农效应，尤其是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信息、知识、技术在不断汇集，政府继续普遍干预金融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因此，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果其实是动态变化的。

金融改革的方向与原则

现在大家明显感受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量在减弱。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进入下行区间，压力渐大。长期来看，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从原来以投资驱动为主的高速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然而，这种转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持续的创新力。

新发展阶段对金融体系提出新要求，金融体系必须由原来的支持要素投入型的增长转向支持创新型增长、高质量发展。创新有其特殊性，和普通有形产品不同，其投入是实实在在的研发，



产出却是看不到的专有知识。如果申请对专有知识进行保护，看到的结果就是专利。创新的生产过程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失败概率较高，并且主要依靠外部融资的支持。

对于金融体系而言，到底是股权市场还是信贷市场更有利于支持创新呢？简单分析一下股权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特点，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股权市场一方面不需要抵押品，投资者可以享有资产上涨的收益；另一方面有价格优势，投资者可以从股价变化当中提取投资相关信息。信贷市场正好相反，一方面需要抵押品，另一方面即使项目有比较高的收益，但贷款提供方基本上获得的仍是相对固定的收益，而且项目没有价格信息可供银行进行投资决策参考，银行往往根据企业的经营状态（现金流）做出信贷决策。

对比可知，股权市场更有利于支持创新，而信贷市场可能不利于促进创新，这是共识。

中国的金融结构仍主要以间接融资、即以银行主导的信贷市场为主，而股权市场的发展相对比较滞后，所以中国的金融结构可能不利于支持创新，或支持力度不够。这也是金融不支持实体

经济成为近几年热点问题的一个主因。

但如果进一步研究，我们会发现信贷市场并非对所有的创新都不支持。创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本性创新，从 0 到 1，从无到有；另一种是渐进性创新，从 1 到 N，在原有产品和技术上的基础上改进。最近的研究发现，股权市场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根本性创新，不利于促进渐进性创新；信贷市场的发展更有利于促进渐进性创新，但不利于促进根本性创新。

这项研究对于中国金融体系的含义是，中国的金融体系更擅长支持渐进性创新，对根本性创新的支持不具优势；这套体系更有利于支持大企业和成熟企业的创新，而不善于支持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的创新。

如果要总结中国金融改革最重要的经验，我们提出的两个字就是“务实”，也就是从实际出发，以结果为导向。这种策略可能不是理论上的最优，但实际效果往往不错。

当然，这种策略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比如效率损失问题、风险问题、监管问题等。因此，金融改革仍必须坚定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持续推进。

圆桌对话 | 如何读懂中国金融的特质与改革逻辑⁴

黄益平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张健华

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央行研究局前局长、华夏银行前行长

王勋

北大国发院副研究员

黄卓

北大国发院助理院长、长聘副教授、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黄卓：首先请问三位老师，在你们看来，中国金融体系建设和金融改革中做得最成功的一点是什么？

黄益平：我们对双轨制的改革有很多解读，因为双轨制的一轨是“管”，一轨是“放”，金融市场也是如此。中国金融改革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读懂中国金融》这本书里都有总结，但如果一定要举出最好的一条，我认为是市场化的改革。

张健华：我同意黄老师所说，坚持市场化应该排第一。对中国金融改革最突出的特质，黄老师在书中选的一个词是“务实”，我认为还有一个词叫“可行性”。“可行性”和“务实”相关，但不完全相同。因为，即使一个方案制定得很理想，也够务实，但最后可能由于条件不完备，或几个部门之间博弈，最后使方案得不到推行。所以改革方案一定具备“可行性”，这样才能减轻执行中的阻力。“可行性”非常重要。

王勋：两位老师所言我都赞同。我如果加一个词，会选择“有效”。中国金融改革有效地支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在应对金融风险时，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有了高速增长，在解决金融风险方面就有更多资源。2012年之后，中国的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应该是近十年来中国金融体系比较重要的创新。相对宽松的监管，对于支持数字金融创新也起到关键作用。

黄卓：中国推进金融改革的成就能否总结为金融发展道路方面的中国经验？一种务实推进改革的经验，一种讲究改革可行性的经验，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改革，有没有借鉴意义？

黄益平：在各国金融的改革和发展中，想总结出一条原理性的策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适用，特别不容易。原因在于任何政策都会产生正面或负面效果，而且这种正面或负面效果在

4. 本文根据四位嘉宾2022年10月13日在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8期暨《如何读懂中国金融》新书悦读会上的对话整理。



不同国家和不同阶段的相对重要性都不同。也就是说,同样一条政策在一个国家的一个阶段管用,在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阶段可能就不管用。因此,如果有一条原理性的普适经验,不应是具体做法,而是一种理念,那就是金融改革的政策要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权衡利弊,然后做利大于弊的选择,同时随着时间和发展阶段的推移进行动态评估和调整。

张健华:我完全赞同黄老师所言。我特别推崇这本书,就因为他用了一套比较规范的分析框架来解读中国的金融改革,并且这种分析框架可推广、可复制。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改革都有本国特色。中国的改革早期借鉴西方经验,今天很多基础性制度安排仍借鉴西方。不仅是中国,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也要走这条道路。从世界的发展趋势看,从多年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模式看,各国还是必须把市场排在第一位,尊重市场、尊重规律,然后再结合自身特色。中国的经验可以作为其他国家参考的案例,但不能成为他国照搬的方案。

黄卓: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研究银行与金融危机的三位学者,包括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这也说明全世界都非常关注金融危机,特别是商业银行的风险。黄老师在书中也写到中国的金融体系在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特别是应对金融危机方面成效不错。想问黄益平老师和王勋老师,中国关于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实践经验,是否与今年诺奖得主的研究成果有一致性?能否对这个理论提出一些新的洞察?

王勋:伯南克主要研究大萧条,他把大萧条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今年另外两位诺奖得主的研究主要关于银行挤兑的原因和避免办法。西方的研究主要结合西方的理论,中国的做法有中国的特殊性,但方向应该是一致的。比如,中国解决风险的做法一般是政府兜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但现在这样的做法越来越不可持续。在我看来,中国现在的一些做法与三位诺奖得主提出的做法正逐渐趋向一致。比如中国对包商银行

的处理与诺奖得主提出的存款保险类似。

黄益平:三位学者,特别是伯南克最令我欣赏之处是他们做研究的目的是为实际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有些学者是先有理念,然后去现实中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理念。但我认为,学术研究更应该像中国金融改革一样,用务实的态度来研究实际问题。如果现实中的一些证据跟你原来的想法不同,就要修正自己的看法,改变自己原有的理念。这是我从他们身上获益最多之处。最近也有媒体开玩笑说这些学者尽管获得诺奖,但也只是个“理论奖”,因为即便是伯南克也没有能力阻止金融危机的暴发(2008年次贷危机)。其实金融危机是永远都会发生的。我原来在金融行业工作时有一个说法:金融危机总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以你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对过去危机的学习和分析,找到一些防范或者缓解新危机的手段。当然,即使总结出了方法,仍不能认为一定能够避免新危机,人类的能力还没到这一步。我甚至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对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动荡做充分的思想准备。其实我们对危机也不必恐慌,关键是能有比较好的办法应对,不要让其演变为一个系统性大事件。

黄卓:再请问张老师,这几年国家在持续推进金融行业的对外开放,但一方面外金融机构在国内发展得并不算快,体量也不是很大;另一方面,中国居民的对外投资也受到一些限制,而且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也是刚刚才起步。张老师在央行、商业银行都工作过,现在是金融学教授,您如何看待接下来几年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前景?

张健华:从2000年入世谈判成功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一直在推进。但确实如你所说,外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准入是渐进的过程。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起初并没有完全放开,对外资设立机构、外资占股等有一些限制,现在又

加快了开放的步伐。我个人的判断是，由于中国有这么大体量的市场，外资机构的进入对中国的银行业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关键在于，银行业其实是重资产行业，投入很大，外资企业在这些传统的银行业务方面也可能不愿意有很大的布局。但在高端金融服务方面，比如居民财富管理、大资产管理，这是中国未来金融发展特别重要的领域，外资机构会加强布局，而且他们有渠道，能够内外联通，因此具有竞争优势。外资金融机构可能在这方面将对国内金融机构有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第二个原因是开放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外资进来，另一方面是中国机构走出去。很多中国人需要境外的服务，但这方面我们自己的金融机构确实有短板。比如，尽管我们现在有一些QDII（国内机构投资者认证），但中国拿到QDII资格的机构实际上能力不够强，很多时候还要靠外资机构的服务。换句话说，国内国民财富的全球配置仅靠我们自己的机构还做不到，仍需依靠外资机构。因此，一些高端客户和一些价值较高的服务就有可能向外流失。

在未来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力度的背景下，这一点可能生变。尽管当前出现逆全球化思潮，但整体而言，做得比较好的企业还在走出去，走出去就需要全球性的金融服务。所以在企业金融服务方面，国内金融机构还有机会，至少可以通过与境外机构合作来提供一些跨境服务。对中国金融机构而言，一种方式是自己直接走出去，另一种是和境外机构加强合作，为国内企业走出去服务，这可能是一个趋势。

黄卓：请教黄益平老师，之前几十年，中国金融改革一直有对标，但现在随着我们金融业的持续发展，特别是数字金融领域，技术上或在市场规模上已经在世界上处于相对领先的位置，前方不再有简单清晰的对标。那么，在这些领域，下一步创新发展中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黄益平：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对金融没有概

念，当时只有一家金融机构，计划经济本身也不太需要金融中介，所以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我们对将来发展的方向容易找到对标。但这些年确实在变，比如欧美的金融体系也危机频发，已经不足以成为我们继续全面学习的榜样。中国务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结果导向的发展思路，对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更有意义。

在数字金融领域，中国现在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将来怎么走？总结过去十年数字金融发展的经验教训，发现凡是做得比较好的领域都具备两个特点：第一，满足了市场需求，第二，符合金融逻辑。“符合金融逻辑”指的是，做任何交易都必须有控制风险之道。所以将来无论怎么发展，都应该基于这两个原则，具体做法可以再探讨。归根结底，金融要解决实际问题，要管用并能管控风险。

黄卓：最后请问三位老师。面向未来，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最需要改革或加强之处是什么？

王勋：需要加强之处很多，其中最需要加强的可能还是监管的效能。因为我们的监管是机构监管，但现在机构都在混业经营，混业经营之间本身就有矛盾，因而就出现监管空白、监管套利，所以近几年的金融风险不断上升。我们监管体系存在两个短板，第一是缺乏功能性监管，第二是行为监管不够。我个人建议应该把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适当分离，各自有一些独立性。所以监管效能是需要提高加强之处。

张健华：我还是那句话，真正走市场化。怎么去理解市场化？最重要的是不能自认为已经市场化。现在很多主管部门用的工具手段其实不够市场化，关键就是他们对市场化的理解不足、不准确、不到位。很多工具手段属于行政干预的范畴，却打着市场化调节的旗号，这可能导致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被扭曲。市场化不能人为随意解读，部门或个人的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过大是不行的，要有规则。关于市场怎样是有效的，哪些是真正市场化导向的，其实并不太复杂，关键是能否真



正去理解，真正想按照市场规律去做，真正对自己的权力加以约束。这一点很关键。

黄益平：我非常赞同张老师所言，市场化改革一直是特别重要的，未来仍是最重要的。但金融体系的市场化除了我们自己的改革措施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部条件是中国的金融抑制政

策。中国的金融抑制其实与整体渐进式双轨制改革有关。举例来说，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但银行即便不考虑产权问题，从风险控制角度考虑也会对国企和民企有不同的资源配置。这说明，只有在背后做更大的改革，真正的市场化举措才能落到实处。所以真正的市场化还需要更大更系统化的机制调整。

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逻辑与世界意义⁵

林毅夫

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尊敬的李校长、谢校长、曲院长、孙校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最近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全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的中心任务。借此机会，我分享自己对三个问题的理解：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意义是什么？

现代化是西方社会自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尤其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重要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重要特征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样的现代化从西方国家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推广，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因为大家都期望过上繁荣富足的生活。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既有和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中国自己的特征。

二十大报告中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我简单地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与西方现代化的特征做一个对比。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固然，西方国家从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开始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但直到现在，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仅有 16%。中国如果实现现代化，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将会从 16% 增加到 34%。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确实是物质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大增，但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几百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希望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物质极大丰富，但存在精神贫困。中国希望能够根本

5. 本文根据林毅夫教授于2022年12月1日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解决这一问题。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方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对环境造成很大破坏，现在我们都关心全球气候变暖，这基本上是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二氧化碳大量排放造成的结果。中国希望在现代化过程当中能够避免同样情形再度发生，能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通过和平发展道路实现的现代化。中国不会像西方一样在殖民掠夺的基础上进行物质积累而得到现代化。

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这五个特征确实非常宏伟，如何才能实现？

我个人的理解是，除了第一条——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是中国的先天条件之外，其它四个特征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道路选择而取得的成果。

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有这样的结果？从我这些年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总结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而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按照具有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特征的、即在每个时点上给定又随着时间动态变化的要素禀赋，以及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发展经济。这样，就能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二至第五个特征。

原因在于，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就可以在初次分配时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有效率，经济就能相对快速地发展，财富就能相对快速地增加。如果在初次分配的同时实现公平，就为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政府的税收也会增加，政府也就更有能力在二次分配时解决弱势群体、鳏寡孤独、地

区差距等问题，进而推进共同富裕。并且，政府也可以用税收等方式来倡导慈善捐赠（三次分配）。这样，就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有句古话：“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大家能共同富裕，就能够在物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实现精神文明的发展，二者相互协同。并且，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大家共同富裕，就会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不断提高。美好生活的期望中包含对美好自然环境的追求。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也会有自生能力，更愿意和能力采用绿色环保的技术生产。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不依靠掠夺，而是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由互利共赢的贸易在一个开放的、公平竞争、全球化的环境中发展，因此中国的发展不仅提高自己的财富水平，也会给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机会，实现和平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共同的追求。过去，由于现代化只发生在西方国家，所以大家总以为现代化只有通过西方式道路才可以实现。但二战以后的实践表明，按照西方道路去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基本上没有成功的先例。少数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现代化，但走的并不是西方道路。

二战至今，虽然每个国家都在追求现代化，但它们跟工业革命以后实现现代化的几个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其实在扩大。最近我们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900年攻打北京的“八国联军”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八个国家，八国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世界的50.4%。一百年后的2000年，世界上有个“八国集团”，有七国就是“八国联军”中的七国，只有第八国奥匈帝国换成了加拿大。2000年，“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到全世界的

47%，比1900年的50.4%仅下降3.4个百分点。换言之，其他国家经过一百年努力追赶这八个工业化强权，但其经济总量仅上升3.4个百分点。而且，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比较慢，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比较高，所以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总量虽然增加3.4个百分点，但人均量的差距反而在扩大。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现代化，未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甚至相对而言变得更贫穷。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过去的现代化为什么不成功？在我看来，过去我们总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发展中国家都以西方国家为参照，看西方国家有什么，我们缺什么，因而总希望拥有西方国家有的；看西方国家什么做得好，我们做得不好，然后希望能够按照西方国家那样去做；或者看到西方国家认为什么是重要的，就认为这些东西对于发展中国家也重要。

以此方式追求现代化，出发点虽好，但数据表明实际结果远远不及预期。

在我看来，照抄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其错误在于认知不正确。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西方国家有什么、什么做得好、什么东西重要，这些都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同样的经济基础，却去追求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现代化标准，必然失败。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的现代化之路，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相比，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新结构经济学是从辩证唯物主义所主张的具有物质第一性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出发点。简言之，看自己现在有什么，这就是自己的要素禀赋。按照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就是根据现在有的，能做好的，然后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把自己能做好的做大做强。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才是重要的，而不是发达国家认为什么重要就对自己也重要。

按照这个思路，每个发展中国家在当前拥有的禀赋下，总有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根据每个发展中国家现在有的，总是能找到它可以相对做得好的，然后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按此思路行事，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能够实现长期稳定快速地发展，实现追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

在我看来，中国式现代化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参考借鉴就是这个道理——以自己为参照，而不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看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有的可以做好什么，然后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把自己能做好的事做大做强。按此循序渐进，构建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就能够实现。



中国经济的关键挑战与应对⁶

姚洋

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挑战一：消费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如此大的下行压力，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内需不足。为什么会内需不足？首要原因还是疫情防控政策造成的。针对早期的德尔塔新冠病毒，我国的疫情防控非常成功。奥密克戎病毒出现后，我国继续执行动态清零政策，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奥密克戎的传染性非常强，不像德尔塔病毒那样，只要封锁传染路径就可将其掐断。现在封锁住一地，另一地可能又出现病毒，还有很多无症状感染者，不测核酸根本无从发现。

在此背景下，奥密克戎病毒引发的新冠疫情沉重打击了消费，老百姓的消费信心下降了近30%。德尔塔病毒爆发时，尽管全国一半以上的城市都采取了封城措施，但大家的消费信心并没有如此大幅地下降。由此可见，当变种新冠病毒再度袭来，我们采取同样的措施加以应对，未能收到同样的效果，还有一些负面影响是迟滞性的、衍生的，反而可能引发更强烈的心理变化。

挑战二：房地产

在2020-2021年间，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至少在三分之一以上，对于经济复苏的贡献可能比出口还高。随之而来的是房价上涨，于是2021年初几部委联合出台了“三条红线”，把

房地产企业划为红橙黄绿四档，这基本上意味着房企无法再增加新的贷款。随后银行也将不同类型的房企“划档”，给身处不同档位的房企规定了贷款上限。这在无形中给银行一个暗示，即不能给房企放贷，这样的做法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来政府发觉上述政策对房地产打压过度，开始转换政策，比如“因城施策”。今年以来政府继续回调政策，但效果似乎不太明显，房地产业还在下跌，相关投资跌得越来越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第一次出现因为大量房企无法交付房产而影响到消费者，致使消费者对购房失去信心。这和以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以前只要政府稍加鼓励，消费者就会买房，至少有买房的信心。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交房风险只是其中之一，预期房价下跌则是另一个原因。

尽管政府和老百姓都认为房价太高，但所有地方政府都不想让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房价下跌，只想把房价抬上去。这很好理解，地方政府近一半的收入都是通过卖地所得，与房地产息息相关，因此地方政府当然不愿看到房价下降。

我曾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某中心城市书记调任另一座城市，履新之后，这位书记认为现任城市的房价水平与其中心城市的定位不匹配，于是采取措施大力吸引人才，一年之内吸引了十几万大学毕业生前来安家，该城市的房价也随之

6. 本文根据姚洋教授2022年11月13日晚在北大国发院“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2期上的演讲整理。

水涨船高。这从侧面反映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愿望，房价高，卖地价格就高，税收和地方政府收入都随之增长。相比之下，老百姓则相对理性，房价太高就先不买。

挑战三：出口

出口仍然是今年经济增长和经济复苏的强大支持。倘若出口的增速也下降，今年前三季度的增速可能连3%也达不到。然而从10月份开始，我国出口增速开始下降。美国通过高利率出人意料地把通胀压制住了，至少是出现了拐点，于是大家纷纷猜测，明年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是否会陷入真正的衰退？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出口也会受到影响。一旦出口延续负增长的态势，或增长微弱，我们明年的经济增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CPI也同样是问题。如果不考虑猪肉价格的因素，我们的CPI已经是负值，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通货紧缩的通道。目前正值猪周期回调，在猪肉价格的影响下，我国CPI暂时保持了正值。这样的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CPI也不能永远依靠猪肉价格。

如果我们不采取相应措施，经济可能会进入通缩，再叠加以上所述不利因素，届时中国经济复苏可能会面临很大挑战。

必要的政策调整

令人振奋的是，二十大之后政府的行动比以前更快，步调更加一致。

房地产方面，央行和银保监会连续出台政策，允许资质好的房地产公司发新债。最近龙湖地产发了200亿的债，这是个积极的信号。11月13日，两部委又联合发布“254号文件”，颁布了“16条”政策。在我看来，这释放出一个信号，即整个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要给房地产企业有针

对性地发放贷款。

过去，管理部门给银行额度让银行放贷，然而没有一家银行敢给房企放贷。因为银行不确定放贷后，钱是否收得回来。这次的“16条”里明确规定，银行给房企放贷，如果已经做过尽调后仍然出现坏账，导致钱收不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不会被追究责任。我认为这一条政策的力度很大，一定能看到效果。此外，“254号文件”要求银行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

希望这样的政策能够真正落地，提升房地产业从业者的信心。正所谓信心比黄金更珍贵，一旦信心回来，房企又开始买地收地，房价下跌的压力也会减弱，老百姓感受到市场复苏的迹象才可能掏钱买房。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但房地产本身也具有金融属性，跟股市一样遵循“追涨杀跌”的规律。房价跌跌不休，老百姓会觉得房价还有下降空间，这样就没人会买房子。只有明确感受到房价要涨的信号，老百姓才会买房。

关于疫情，中央近日也出台了防疫20条措施，我认为这非常振奋人心。这也是我过去一直在呼吁的，疫情防控一定要精准，最好是精准到个人。防疫20条措施已将防控精准到单元，明确说只能封单元，没说封小区，也没有说弹窗，这是非常大的进步。这意味着整个中央层面已经意识到现阶段防控措施成本太高，需要做出必要的改进。

好政策还要真正落地

政策有了调整，下一步还要真正将政策落地，这一步也非常重要。

房地产方面主要是254号文件的细化，要实实在在地让银行敢于放贷。我记得在前段时间北大国发院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中银国际证券总裁助理徐高曾建议组建一支“国家队”，筹集一万亿资金购买优质房企的股票，以此稳定“军心”，恢复市场信心。



除此之外，我认为还得让市场发挥作用。房子该降价的还是要降价。只有房价跌到一定水平，老百姓才会觉得再不出手买房可能会后悔，这时候需求自然会回归。现在每个城市都在等着，下命令不让降房价。倘若市场无法自动出清，仅靠政府单方面努力，我认为消费需求仍然难以回归。很多城市都在执行“保交楼”，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只能说明力度还不够。政府通过各种政策筹措的几千亿资金支持，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体量而言远远不够。我认为必须出现一些非常显著的信号或指标，让老百姓觉得政府对房地产行业仍然很有信心，这样老百姓的信心才会回来。

防疫方面，最新的防疫 20 条措施出台后，许多城市立刻对防疫政策做出较大改进，比如广州。北京也做了一些改善，但目前还没有看到实质性举动。北京是具有信号意义和经济网络枢纽价值的城市，如果北京不变，整个经济活动就无法盘活。放眼全国，有许多已经封控很久的城市并不符合最新防疫 20 条措施关于封控的规定。因为 20 条明确规定不能随便封区，更别提封城。

在我看来，最新的防疫 20 条措施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说透，尽管具体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是放松管制，但执行原则仍在强调不是放松管制，而是加强防疫。对地方政府而言，惯性思维肯定认为还是防疫第一。防疫搞不好，需要承担责任，而且责任很明确。但如果经济搞不好，责任不大，而且搞活经济必须举全国之力，并不是单凭一个城市的力量就能做到。权衡之下，地方政府难免继续选择防疫优先。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中央要明确表态，不能“既要又要”，应当明确工作的优先级。到目前，我们已经损失了三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

差不多相当于 3 万亿人民币。北京快一年了还不让办婚礼，按照中国老百姓的观点，新人不办婚礼就不能算结婚，不结婚也不好生孩子。我国人口已经接近负增长，这样的情况对生育率也不利。

我们经常讲防疫要算政治账，我们国家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生活就是政治账。奥密克戎病毒传染性强，毒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防疫的重点应该是防重症、防死亡，而不是防感染，更不是简单粗暴地全城封控来防感染，不计代价地防感染。曾经有人做过计算，以我国目前 ICU 的数量，外加这些年建造的方舱医院数量，我们完全有能力应对重症。

我绝不是主张像美国那样躺平，核酸还是应该做，3 天一次或 7 天一次，有利于筛查感染人群，但我们一定要允许老百姓流动。现在很多人不敢外出旅行，因为一旦出城，回城的过程很难，至少是很不确定。我个人也希望北京能带个好头，防疫日趋理性。首都北京带好头，其他城市自然会跟上，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尽管老生常谈，已经说了两年多，我依然要提议给老百姓发钱。发钱的作用不仅是让老百姓高兴，挽救已经严重下跌的消费信心，还能挽救已经步入借债生活的失业人群。对于这部分人，我们应当给予更多关注，可以通过发放消费券帮助这部分人渡过难关，这对稳定和提振信心有很大帮助。

我想在这里再次呼吁政府多一些考虑，希望地方政府在防疫过程中多向最新的防疫 20 条措施看齐，更精准地防控疫情，更多地考虑普通老百姓的感受。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快速复苏。

全球滞胀来袭，中国如何应对？⁷

卢锋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

任慧

北大国发院博士后

2020年初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在疫情、政策与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范围经济供求关系格局与通胀形势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一是疫情早期冲击导致通胀下跌、探底与低位企稳阶段；二是2021年全球通胀快速升温，以及美西方大通胀格局初步形成阶段；三是今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通胀压力加剧，发达国家加码货币紧缩，治理通胀阶段。

去年俄乌关系紧张和今年乌克兰危机冲击天然气正常供应，对欧洲影响尤其大。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俄罗斯则采取反制措施，天然气国际市场价格持续走高。天然气供给危机可能在今年冬季和明年才能达到顶点。

美国作为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发行国，通过货币紧缩应对通胀，其外部溢出效应令其他经济体治理通胀更加困难。美联储今年3月以来激进加息，不仅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引入广泛贬值压力，而且导致包括欧元、英镑、日元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进口价格因贬值上升导致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加治理通胀难度。今年初以来，绝大部分G20成员经济体货币都不同程度贬值，贬幅最高的阿根廷和土耳其超过30%，最低的印尼4.1%，日元、英镑和欧元分别贬值21.3%、18.1%和14.3%。

2022年美西方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美国经济一、二季度环比增速出现负增长。通胀上升或缓慢回调与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组合的现象，提示大通胀治理可能导向滞胀局面的现实演变逻辑。9月16日世界银行发布报告《全球经济衰退迫在眉睫？》(Is a Global Recession Imminent?)指出，随着多国央行纷纷加息，2023年可能出现全球性经济衰退。由于疫情和能源危机等供给侧冲击具有全球影响，加上滞胀风险突出的美西方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具有较大影响，目前表现为全球滞胀风险。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新兴经济体，疫情期间的经济运行与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呈现系统性反差，近年来经济增长特点之一是总需求偏弱，CPI受到机制性抑制，滞胀不太可能成为下一步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

疫情期间，中国实施强有力疫情防控政策与灵活务实的宏观政策，在实现生命至上、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综合目标方面取得来之不易的成就。中国出口在疫情期间逆势大幅增长，为满足全球需求做出了突出贡献，彰显了制造大国的独特全球地位。受疫情影响，中国经济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挑战，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环境下CPI均值甚至低于疫情前水平，与美西方大通胀形成鲜明反差。中国在相关环境和供大于求格局实质性

7.本文来源：《中国日报》2022年11月2日。



转变之前难以发生严重通胀。虽然疫情期间经济增速回落,且今年二季度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加大,中国凭借逆周期宏观调控工具较多与执行力较强的优势,仍有能力避免经济持续下滑与衰退前景。

尽管中国经济在可见未来遭遇典型滞胀可能性较小,但外部滞胀风险仍会带来冲击。一是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紧缩及全球滞胀风险释放会抑制中国出口,考虑到中国经济受疫情影响内需不足,近年外需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升,因此尤其需要关注外需变动对中国的潜在不利影响。二是美元流动性紧缩会加剧一些经济基本面较弱的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偿付困难,中国作为部分国家的重要债权方,利益会受到相应影响。三是美欧两大主要国际货币发行经济体,其通胀调整或滞胀展开如果诱致更为复杂的危机连带发生,可能会对中国逼近十万亿规模的对外金融资产造成减值风险。

针对目前形势,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与宏观政策,着力提升国内消费和投资增长,巩固近来宏观经济复苏转好态势,顺

势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度。其次,要坚持推进国际经济合作与维护经济全球化方针,总结中国近十年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经验,就化解与中国债权债务关联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困难研究提出中国方案,为下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合作水平创造条件。再次,考虑到主要发达国家紧缩政策的全球影响,在G20等国际合作平台和IMF等国际机构督促发达国家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同时,关注其负面溢出效应。

目前美西方大通胀与滞胀风险,显示其依托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特权,过度刺激谋求增长的政策空间可能显著收窄,意味着美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前景进一步逼近。然而,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只有在新兴经济体及其货币经过内外历练,具备替代条件后才能系统发生。这就要求我们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针对新的内外经济环境,在体制改革、宏观政策、对外开放等方面系统谋划必要调整创新,通过构建针对现实与面向未来的高水平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推动百年未有变局朝着有利于中国经济现代化与全球经济良性发展的方向展开。

国家医保制度的发展创新：药物经济学 成为价值购买的重要抓手⁸

刘国恩

北大国发院教授、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国家医保谈判药物经济学专家组组长

吴晶

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中国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准入与调整工作是近年启动的一项惠及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工程，旨在提高居民用药保障水平、减轻患者医疗负担。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以来，广大群众多层次的健康需求持续增长，同时越来越多的创新药品也不断问世。充分利用有限的医保基金促进参保人最大的健康状况改善，始终是国家基本医保制度的核心目标。

2018年以来，国家医疗保障局践行以价值为基础的谈判理念，连续四年开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工作，累计有250种创新的、救急救命的药品通过谈判新增进入目录，价格平均降幅超过50%。2021年，协议期内221种谈判药累计报销1.4亿人次，为患者减负1494.9亿元。总体而言，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工作取得了预期的惠民成效，其中基于药物经济学评价的价值购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药品价值评估的全球视野

药品价值评估是“以价值为基础”确定药品平均价格的科学理念。其基础工具为药物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评价，通过对比创新药品与参照品的增量健康产出与增量成本的差异，寻找新进药品具有“效价比”的价格基准，践行药品价值评估的核心理念。通过以相同或更低的成本获得更优健康产出的价值购买，药物经济学评价旨在基于证据判断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

事实上，药物经济学已成为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众多发达国家在制定本国药品医保准入与支付决策时的重要工具。国际实践越来越证明，药品价值评估可以更好遴选出综合价值更高的药品纳入医保目录，短期看可以更好兼顾医保基金使用效率和患者公平性，长期看也应该有助于医药产业的研发创新。总之，

8. 本文来源：人民网2022年11月7日。



建立完善的药品价值评估体系，充分运用药物经济学证据，对于促进创新药品纳入医保目录、提高医保基金管理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医保践行国际药物经济学评价理念

2018至2021年，国家医保局连续四年开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工作，这意味着中国医保目录评审从“专家意见”评审跨越到了“循证决策”的新阶段。经过四年的探索，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形成了比较系统、科学、规范的价值评审流程，包括专家评审、药品价格测算两个关键价值评估环节。

专家评审主要依据药品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公平性五个维度评估药品的综合价值。评审融入了中国疾病谱特征与现行医保目录覆盖情况、中国疾病流行病学特点、分级诊疗制度下的基层用药需求等本国国情要素，并着重强调公平性维度，有针对性地弥补目录短板，从而得出是否给予新进药品谈判（或竞价）准入的资格。

价格测算环节则主要由药物经济学专家与基金测算专家针对谈判药品背对背分别开展价格测算。药物经济学专家主要通过通行的药物经济学方法和预先设定的经济性阈值测算基准价格。在此基础上，辅助参考各省招采最低中标价格、重点国家与地区的国际最低价格、疗效相似的竞品价格等，对基准价格进行调整。基金测算专家则主要评估医保基金可负担性。此外，测算过程中还考虑传统中药的特色与优势，有针对性地进行进一步优化评价维度和测算指标。

回顾测算流程和谈判结果，国家医保目录在“保基本”基础上对“促创新”给予更大力度的“加分项”支持，从而促成了创新药物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空前的步伐，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深入巩固医保目录“保基本”的底线原则，目录结构不断优化。以2021年为例，新

增的74种药品涵盖了肿瘤用药（18种），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用药（20种），丙肝、艾滋病等抗感染用药（15种），罕见病用药（7种），新冠肺炎治疗用药（2种）以及其他领域（12种）。其中对于备受关注的罕见病用药，截至目前已经有40余种药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涉及26种疾病，是国家医保“保基本”的突出成绩。

第二，提高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的速度。2021年新增进入目录的74种药品中，有27种药品为21年获批上市。此外，2021年进入谈判的23种国产重大创新药品中，22种谈判成功。创新药从获批上市到纳入医保平均周期仅为一年零两个月。

第三，破除人们关于“创新药=天价药”的固有观念。2021年，目录外参与谈判的85种药品中，有67种谈判成功，成功率为78.8%，降价幅度高达61.71%，均高于2019与2020年。以抗肿瘤药为例，2018至2021年国谈药品中，抗肿瘤药品数量占比一直维持在20%及以上，价格平均降幅维持在44%及以上，曾经医疗费用高昂的肿瘤免疫治疗PD-1已有4个国产创新药纳入医保。2018年的抗癌药专项谈判成功率高达94.4%，价格平均降幅56.7%，缓解了癌患者的用药难题。

药物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创新

为了实现“患者有药用、企业有回报、医保可控费”的三方共赢目标，国家医保目录的完善在药物经济学的应用实践中，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探索创新。

经济性阈值是性价比指标中推算价格的关键参数。过去四年来，国家医保局围绕经济性设定标准，顺应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医保支付能力，不断对阈值进行调整更新。制度设计之初，主要依据临床专家评审的药品临床价值设定阈值。近两年来，国家医保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阈值确定

的新方法、新思路。

一方面，充分考虑药品的临床价值、患者获益与创新性，将是否填补临床空白、是否有突破性创新、是否为罕见病药物等创新药品特征与阈值设定直接挂钩。另一方面，将临床专家评分等级与阈值等级挂钩，即将临床专家针对药品创新价值、临床获益、患者获益等维度的打分分数直接定量映射到相应阈值中。国内药物经济学专家也在积极探索从社会角度测算阈值，助力医保决策部门进一步科学化运用阈值标准，实现医疗资源公平与优化分配。在药物经济学方法的运用中，国家医保目录的调整完善坚持立足中国实际，在价格测算中把握“保基本”的定位，在考虑参保患者的承受能力基础上，尽可能利用政策手段促进新药落地，通过“以量换价”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

不断优化政策和程序、降低企业负担也是国家医保工作的目标之一。2020年以来，国家医保局为医保实际支出相对符合预期的药品实施简易续约，即根据协议期内的医保基金支出确定药品是否还需要降价、降多少，无需再次谈判。自2022年起，对于新增适应症的药品，如其新适应症下医保支出较小、可控的药品，也可通过简易续约，实现新增适应症进入国家医保。同时，国家医保局开始向企业开放谈判药品医保基金支付数据查询渠道，数据公开透明，为后续药品续约提供了充分的数据基础。

加快完善价值评估机制 更好惠及企业和患者

随着今年6月国家医疗保障局《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的公布，2022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在今年的工作方案中，首次公开了谈判药品简易续约的规则，新增了简易新增适应症的规则，

新增了非独家药品竞价谈判等创新机制，使企业对规则更加明确，对结果预期进一步提高。同时，广大患者也能够更加“买得到、用得起”创新药品，促进创新药物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坚持“价值购买”决策 期待国家医保更加优化

着眼未来，为更好发挥价值评估在国家医保战略性购买中的作用，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更好践行。

第一，在国家医保“价值购买”的指导思想之下，进一步明确国家医保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药品支付范围和水平，通过“价值导向”的新增药品不断优化医保目录的“腾笼换鸟”。

第二，根据公众日益提高的多层次需求以及不断上市的创新药品特点，完善健康获益和经济效益指标，促进医疗资源的更优配置，提高国家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

第三，推动更多基于国内真实世界数据的证据优先用于国家医保的价值评估与准入支付。

第四，在继续推进价值购买理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有条件准入、风险共担等创新性支付手段，进一步促进医保基金风险管理与国家医药创新发展的相容性。

第五，全面建立准入后评价机制，促进价值评估的持续性证据与常态化纠偏，完善医保价值购买的制度基础。

第六，深入总结中国通过药物经济学进行价值购买的做法和成效，强化理论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药物经济学理论体系。

随着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实践的推进和相关改革的深化，我们期待在医保政策管理和药物经济学领域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效，向世界贡献基于中国实践的经验和启示。



数字时代下的多元雇佣关系⁹

李力行

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
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北大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

第一，数字技术是推动职场雇佣关系变更以及其他就业变化的主要推动力。

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一方面刺激了数字产业的迅速发展，另外一方面也改造了传统行业，让传统行业当中的生产、服务过程被分解。举个例子，电商销售涉及到生产、广告提供、交易、售后服务、配送等一系列过程，分别由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人来完成。

再举个例子，外卖配送包括餐饮烹饪、广告发送、配送和售后服务等过程，也是由不同的主体来提供的。这其中外卖骑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生产服务过程的分解，大大降低了就业门槛。一个骑手只要有一个电动自行车，就可以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提供服务，获得收入，同时他跟这个平台或者是商家的关系也不再是原来固定雇佣的紧密关系。所以数字技术进步是雇佣关系变更的重要推动力。原来都是一对一的雇佣关系，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老板的雇佣关系，现在更多地被灵活就业、多元雇佣等等所替代。比如，一个视频博主，一个主播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发布自己的产品，在不同的平台直播带货，一个外卖小哥可以在不同的平台接单，都体现了雇佣关

系多元化。

第二，在雇佣关系多元化的基础上出现了很多的新兴职业。

我们的报告发现，零工经济和线上娱乐相关的职位数增幅扩大，今年1-7月翻了两番。这其中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为代表的零工经济工作者，他们要依赖于数字平台接单；以主播为代表的线上娱乐等就业群体，也是在数字技术的进步之下发展起来的。

此外，我们的报告还发现，跟数字技术、新兴服务相关的一些新兴职位占比大幅增加，在智联招聘发布的所有广告当中，职位占比从15%增加到了20%，这中间就包括了类似元宇宙这样的一些新兴职位。

这种新兴的数字化技术进步和新职位的涌现，实际上也赋能了弱势群体。大家想一想，原来残疾人很难找到适合的工作，但是现在很多残疾人可以足不出户做云客服。偏远山区的农民可以在手机前面通过直播售卖自己家乡的土特产品。数字技术赋能这些弱势群体，也是新兴职位的一种

9. 本文根据李力行教授2022年10月12日在北大国发院和智联招聘联合主办的“2022中国年度最佳雇主百强雇主榜单发布仪式”上的演讲整理。

涌现。利用手机 APP 接单，可以自主决定什么时候工作，在哪里工作，为谁工作，这种多元就业的可能性，符合年轻人的偏好。

第三，我们面临的挑战。

在多元、灵活的雇佣关系下面，劳动者、平台、商家不再是原来一对一的固定雇佣关系。许多劳动者不签订劳动合同，也就意味着他们得不到原来传统就业那样的保障。我们国家的劳动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都是以固定的就业单位为基础

而建立的，没有固定的就业单位，也就得不到培训及其他一些公共服务。随着多元就业的增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保障问题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的报告发现，即便对于这些由就业单位发布的职位来说，提供五险一金的占比也只有 60%，而且呈缓慢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新一代的就业者，以 00 后为代表的年轻人，他们对劳动保护的诉求却特别强烈，有超过七成的受访者对劳动权益的损害说不。显然，在劳动保障方面，需求和供给出现了不匹配。如何解决多元雇佣关系下劳动者的保障问题，值得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仔细研究。



00 后的多元求职心态与工作形态¹⁰

胡佳胤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助理教授、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今天的主题是“00 后的多元求职心态与工作形态”。实际上，我们很难给 00 后群体打一个标签或者下一个定义。90 后当年也被打上一些标签，而 00 后这个群体更加多元，我们很难用一个字、一个词概括整个群体的行为以及心态。但是毕竟“00 后”这个词代表着他们生活于一个共同的年代，必然会有一个时代共同的印记，比如国家日益繁荣富强，比如独生子女一代，比如共同经历的疫情挑战，还有各种远程在线学习、远程办公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必要通过智联招聘求职者简历大数据，以及针对求职者进行的调研问卷形式，来看一看这个群体有一些什么样的趋势。当然这些趋势都是多样的，所以我们概括起来就是“多元的求职心态”。

00 后向往自由，但是同时也追求稳定。调研结果显示，有超过一半的求职者希望有跨界的成份，不管是跨行业就业还是应聘的职业跟大学的专业不同，这种跨界、跨专业的尝试越来越多，超过他们前辈的求职者。

一方面，有超过 10% 的人表示想追求自由职业。这实际上反映出数字时代、平台时代，年轻人有了越来越多发挥自己才干、实现自己价值的新兴方式。比如视频网站的 UP 主，还有各类数码科技、美妆、母婴知识类的博主等等，自媒体方面的选择越来越多，同时平台也提供了很多

快递、外卖能够兼职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许多人有这样的机会摆脱传统的雇佣关系限制，摆脱传统的公司组织和打卡上班的形式来进行就业。

另一方面，数字时代带来的不确定性、颠覆式的创新变革太大，导致大家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我们在调研当中发现，有超过三成的求职者希望到国企工作，或者目标的职业岗位是国企。

既向往自由又追求稳定的“既要又要”，反映出的并不是贪大求全或者什么都想要，反而恰恰是数字时代带来的多元化和复杂性。

数字时代提供了多元的工作形态，最突出的就是兼职、灵活、弹性的工作以及远程办公。同样，在求职者群体中我们发现，超过一半的人是正在兼职的，这可能跟经济周期密切相关，也体现出越来越多的人以兼职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兴趣或者是多打一份工，多获得一份收入。这都是现在非常可行的选择。

我们发现，有近八成的求职者向往成为数字游民。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一台电脑就可以工作，这是非常理想化的状态。还有 15% 的求职者已经实现了把自己的一些技能变现，包括很多 95 后、00 后的求职者具备互联网或媒体视频编辑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结合数字时代所提

10. 本文根据胡佳胤助理教授2022年10月12日在北大国发院和智联招聘联合主办的“2022中国年度最佳雇主百强雇主榜单发布仪式”上的演讲整理。

供的越来越多的就业方式，实际上求职者可以实现兴趣与职业的良好结合。

我们在针对求职者的问卷调研中特别设计了一个问题，如果00后遇到了合法劳动权益被侵害的情况会选择怎么做？我们提供的选项包括：跟熟悉的同事交流，向家人求助再做决定，其中特意加了一个选项——坚决反抗。结果是有七成的职场人选择坚决反抗，这一点令我们意外，但

是又觉得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维护权益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当且正义的事情，我们自己去捍卫自己的权益，本来就应该这样理直气壮。

有个说法“00后整顿职场”，实际上指的是他们看得更加通透了，信息来源更加广泛，而且确实以独生子女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家庭条件相对较好，没有后顾之忧，因此更有胆量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一个很可喜的职场现象。



一、2022年11月18日，“中意慈善论坛”第二期（2022—2025年）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在“2022北京论坛”期间于北京与意大利罗马双会场连线举行。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龚旗煌出席仪式。合作备忘录签署的三方包括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意大利都灵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与时任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共同见证了《关于设立中意慈善论坛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前副理事长卢迈担任论坛第二期联合荣誉主席。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和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为中意慈善论坛第二期指导委员会成员。

二、2022年11月21日，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9期暨“中国健康老龄化之路：北京大学-柳叶刀重大报告”发布会在北大承泽园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自然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增谦，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北京大学副校长孙庆伟，《柳叶刀》主编 Richard Horton，《柳叶刀》亚洲执行主编王辉等众多嘉宾出席发布会，多位来自不同研究

领域的国内外学者及报告写作团队围绕报告内容深入交流和研讨。

三、2022年11月20日，2022年度“当代经济学博士创新项目”证书授予仪式暨学术交流会举行。北大国发院院长、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姚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守英教授等多位经济学家出席活动并做分享。国发院博士毕业生赖毅和邱晗荣获2022年度“当代经济学博士创新项目”奖励。

四、2022年11月22日，第二十二届中国经济学会年会博士毕业生“学术新星”（Job Market Star）评选结果正式公布，北大国发院两名2018级直博生刘松瑞、权盈月获此荣誉，并将受邀于年会期间做现场报告。

五、2022年12月1日，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召开。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2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欧美智库机构及国内高端智库的知名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参会。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会上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政策和一般意义”为题演讲。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南学院研究办公室主任查道炯教授参与论坛主持。

版 权

主 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主 办: 北大国发院智库 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

主 编: 黄卓

执行主编: 王贤青

执行副主编: 白尧

编 辑 部 (按姓氏拼音)

曹毅、高玲娜、刘海波、王勋、王志勤、朱丽

电子订阅方式

扫描本二维码, 填写联系信息



合作联系方式

电话: 010-6275 9033

邮箱: ybai@nsd.pku.edu.cn

官方网站

www.nsd.pku.edu.cn

官方微信公众号



北大国发院



北大国发院智库